



融汇与争议: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 实证主义的演进与实践脉络

张立,滕晓玉

(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 新技术与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使得起步较晚且受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影响的新闻学研究受到冲击与挑战。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化思维浸润后,传播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引入受到学界的欢迎。实证主义范式和方法不仅使得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围得以拓展,研究议题多元且不断深化,学术研究渐趋规范,而且补充了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情感逻辑,并且检验和发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理论、强化了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性。与此同时,实证主义也面临方法论、知识贡献以及方法缺陷上的争议。技术时代下新实证主义取向应回归价值理性,而现有新闻传播学范式下的理论和方法更加需要拓展,如此才能对新的智能传播现象更具解释力。

[关键词]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新闻传播学科;价值理性;智能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21)02-0140-07

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1978年开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逐渐被引入。20世纪80年代初,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思想伴随着一系列传播学论著被引介到中国,实证主义逐渐被我国新闻学界接受,并得以快速蓬勃发展。1997—2010年,伴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科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飞速涌现的新闻传播技术、理论、问题相比,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进展甚微。基于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史,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新闻传播领域研究方法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进入大数据时代以来,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方法渐趋规范化与多元化,数据科学激活了发展中的新闻传播学科研

究范式、研究方法革新,此时起,思辨、定性、定量等方法取向各有春秋,逐渐呈现出多元的态势。另外,传播学科也引入了被称为超越定性与定量的新的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法。众多学者在新闻传播研究中也引入了实验法、解释结构模型技术、文献计量分析、历史实证主义、行动者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许多新技术与新方法。

回顾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演进与发展,探究其发展趋势与规律,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寻找新的理论创新点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在对社会科学的两种基本范式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顾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中理论与方法贡献,探究实证主义

[收稿日期] 2020-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8JZD022);陕西省软科学项目(2020KRM021);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N014)。

[作者简介] 张立(1981—),女,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探索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发展趋势与规律,通过辨析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交融、争议,揭示方法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隐喻,与整个社会语境、学科发展、技术背景的勾连,并对融汇与争议中的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新的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范式

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发展迅速,实验法、定量统计、经验概括等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重视与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也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范式逐步形成。就其方法论而言,发展出了以孔德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范式和以韦伯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范式。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源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后来由孔德发展,形成了以通过操作事实进行研究为主的社会学研究范式^[1]。实证主义方法主要从经验和归纳出发,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研究结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类。定性研究是解释性研究,多运用观察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文献分析法、文本分析法等对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定量研究是描述性研究,多运用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统计分析法等对事物和社会现象进行描述和验证。

(二)人文主义范式

人文主义范式是在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基础上,经韦伯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研究方法范式,其通常使用“理解”和“解释”的方式去认识社会。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方法的区别在于,人文方法是通过操作概念来获得研究结论,无需收集事实和操作事实,其主要是通过直觉、抽象、想象、比较、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进行研究^[1]。

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这两种基本范式作为理论体系、研究规则和方法结构,决定了研究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价值取向,范式的选择在研究者提出问题、选择材料、抽象方向以及标准确立等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文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之间有明显的差异,然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两种范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提供了不同的认识和观察社会现象的角度,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两种范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长期处于一种相伴相

生、此消彼长的状态。新闻传播学科并不例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众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发展,使实证主义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与媒介研究主流方法论的重要开端。大众传播的环境中,传播主体对劝服、效果、广告、民调、战时动员的核心诉求,与实证主义可测量、利于决策的行政取向不谋而合。自此,留守欧洲的人文主义脉络逐渐式微。在近一个世纪的学科发展与变迁中,上述两种主要范式随着时代、科技、社会语境的变迁,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浮浮沉沉。这种既融汇又充满争议的关系,也体现在大陆新闻传播学科研究范式的动态关系中。透过对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演进与实践考察,不仅可以勾勒出方法论变迁的清晰脉络,也可尝试揭示这种藉由方法论转型所隐喻的社会思潮变迁的草蛇灰线。

二、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贡献

(一)研究范围拓展,研究议题多元且不断深化

1978年,新闻学和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的社会浪潮中萌芽。实证主义范式引入后,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议题多元发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入,关注焦点增多。本文从受众、传播效果、媒介研究方法、媒介技术分析四个方面加以概括。第一,受众研究方面从早期的受众调查进一步细化到受众的媒介接触时间、媒介接触行为、使用动机、媒介素养等问题。2010年以来,对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使用行为、使用意愿的研究逐渐增多,数字鸿沟、文化反哺、使用与满足、技术接受模型、期望确认模型等理论相互交织。如喻国明等^[2]通过物理、行为、心理、媒介以及关系空间等维度对受众媒介接触时间的变化轨迹进行模拟。第二,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传播效果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对媒介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评价,影响因素研究,媒体以及意见领袖的传播效果,新媒体环境下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与发展等方面。如薛可等^[3]以高校BBS中的“舆论领袖”为研究对象,建立了“虚拟舆论领袖”影响力传播模型;郑丽勇^[4]在研究媒介影响力时,建构了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模型。第三,算法推荐技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媒介技术被学界所关注。如周葆华^[5]通过对全国受众的问卷调查,考察算法推荐类APP的使用现状、影响因素及社会影响;师文等^[6]使用计算传播学的方法,考察《纽约时报》对香港修例风波的报道在推特平台上扩散过程中社交机器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模式。第四,媒

介分析的方法和对象逐渐丰富,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法、统计分析法等被广泛运用,研究对象也从传统媒介转向网络媒介。如夏倩芳等^[7]采用内容分析法探讨我国大陆主流报纸媒体上不同群体的媒介形象;喻国明等^[8]通过实验法研究发现纸质报纸和电子书报纸存在人脑认知机制上的区别且具有各自的认知特点。

(二)学术研究渐趋规范,补充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情感逻辑

孙旭培^[9]认为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存在无深度且质量低的问题,这其中就涉及学界对研究方法规范性不够重视的原因,很多学者的研究是“夹叙夹议的散文”或“随感录”,缺乏论证过程。1949—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为人文思辨研究法的主导方法,而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甚至出现“新闻无学”的局面^[10]。事实上,思辨研究中存在经验主义、缺乏逻辑性等问题,有些研究甚至是反科学的。

实证主义则是通过操作事实进行研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得出研究结论,描述和解释社会现象。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渐趋规范,研究者越来越注重方法的科学与严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引入了数学以及统计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使得研究过程更加科学,研究结论经得起检验。例如,汤志伟等^[11]在技术接受模型、媒介可信度理论、媒介依赖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网络新闻可信度评价的结构方程模型。另外,实证主义能够对传统的人文—历史—哲学思维的情感逻辑进行补充。如刘建明^[12]对沉默的螺旋理论提出质疑,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在意识形态产生对立与冲突时就完全不能起到作用,甚至会导致舆论朝反方向演变;陈强等^[13]使用实证方法对“中华女事件”中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的形成进行分析,但并未对沉默的螺旋进行全盘否定,认为在该事件的舆情演变过程中先是形成了沉默的螺旋,后经舆情发酵与理性回归,形成了反沉默的螺旋。

(三)价值理性:检验和发展新闻传播学科理论

实证主义的价值理性体现在对概念的测量以及检验与发展理论上。定量研究常因“对现实的高度简化”被诟病,对新闻传播规律进行研究确实非常困难,但定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操作化的过程,即如何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变量和指标,并且该指标能够得到其他研究者的认同,形成共识,这也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例如,周裕琼等^[14]将数字鸿沟这一复杂概念转化为可测量指标时分成了宏观的国家层面、中

观的社会层面以及微观的家庭层面三个层面与素养沟、接入沟与使用沟三个维度。于文轩等^[15]认为定量研究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对理论进行检验与证伪,或是对理论进行发展,提出新的影响因素或适用范围。国外许多研究都对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行了验证,而陈阳^[16]则通过研究发现2013年北京地区的媒介议程并没有对受众议程产生有效影响,同时也发现了媒介议程在不同时间的高度相关性。

(四)工具理性:实证主义研究推动新闻传播研究成果具有现实应用性

实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以及价值中立的态度都使得其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可信性,因此能够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体现实证研究的社会责任与现实关怀。实证主义使得研究成果在政府决策、企业运营等方面都具有现实应用性。例如,吴锋^[17]对总理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提问机会的选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了应该增加采访机会、考虑多方需求以及丰富新闻发布主体的建议。秦雪冰^[18]通过使用NKP模型挖掘受众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广告商精准匹配其目标受众,以实现广告内容生产的差异化与广告的精准投放。

三、实证主义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争议议题

(一)方法论的争议:定性还是定量?亦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在方法论层面有着相当长时间的辩论。卜卫^[19]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价值观以及对哲学层面上的认知有很大差异,对于真相的解释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否采取中立态度都有完全相反的解释。然而,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将定性与定量放在对立面的想法产生质疑,不断提出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各具优劣,因此开始强调应该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

如今,很多学者都提倡在一项研究中应该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但这种想法也产生了许多争议。

其一,当提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时,对于定性的理解是错误的。一是将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混淆。例如,李彪^[20]在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四种主要学术期刊所载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时将思辨研究纳入定性研究的范畴。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是对应的研究类型,思辨研究操作概念,实证研究操作事实,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思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然后建立概念、设立命题,进行逻辑推演,

直至得出理论性结论。而定性研究则是以事实为基础。定量研究中经常使用思辨的方法进行推论,经常被误认为是定性研究。二是一些学者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把“分析”“想”等非定量的方法归为定性研究。但是这些无论是从技术操作层面还是哲学层面都不属于定性研究的范畴。卜卫^[21]指出定性研究的特征首先是形式上是非量化的,其次内容上应该对事件或者现象做出解释。

其二,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并不适用于所有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已经具备了一套独立的操作体系,因此在各自的研究中都能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如果使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就能很好地对某种社会现象做出解释,那么还有必要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吗?反之亦然。另外,也应考虑到部分社会现象是不能量化的,也有部分社会现象是无需研究者到实地进行长期体验的。从研究经验来看,每一项研究中的核心问题都有与之相匹配的方法论,也就是说当研究者使用某个方法就能够很好地得出研究结论时,就无需使用另一种研究方法。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需要定性与定量方法相结合。方法本身并不重要,学术研究的关键在于研究问题的重要性与相关性,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得出研究结论。

其三,在具体研究中,定性与定量在方法的工具层面的结合可以实现,方法论的融合却难以达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价值观存在差异,关于什么是社会事实的“真相”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持有的立场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课题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情况,但实际上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操作体系分别是独立的,因此这并不代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卜卫^[21]认为在同一项研究中,研究设计既是定量的也是定性的情况是不可能的,而所谓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形式其实是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论,部分步骤是定量的,或者是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论,部分步骤是定性的。因此,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只能在方法工具层面实现。

研究者在对研究方法进行选择的时候,第一是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进行选择,以研究问题为导向,具体研究问题具体选择;第二是根据研究者的个人气质、对各种研究方法的个人能力及兴趣等个人条件^[21]进行选择。从根本上来说,定性与定量能否结合的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产生新思想,因此,研究方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用积极、开放的态度去看待各种研究方法,不要成为方法的

奴隶。

(二)方法与知识贡献的价值争议

伴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与不断发展,研究方法对于知识贡献的价值问题也产生了争议。张敏等^[22]认为,传播学方法的科学使用能够为具体研究增加价值,但同时也会产生弊端,一些研究者会在方法上投机取巧,例如一些研究经过小规模样本调查和简单运算之后,得出一个无需进行调查或者研究就能够知道的常识性结论,而一些不科学和不规范的定性研究也被认为是肤浅和主观的。朱鸿军等^[23]认为,有一些研究只是在研究中引入简单的统计或者分析,只满足了形式上的方法规范,而研究本身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知识贡献。另外也有一种争议是对于追求所谓前沿、复杂的研究方法的批判,这里面暗含了一种“方法至上”的原则,有些研究是为方法而方法,忽略了研究的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三)实证主义在传播学研究中的缺陷争议

其一,量化研究只能研究“可操作化”的问题。操作化的过程是将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成外在事实,从而进行假设检验。操作化的过程体现了实证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理论概念与外在事实之间能否实现准确转换?二是针对不能进行操作化的研究问题该如何处理?例如冷热媒介、潜意识等。针对以上问题,部分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有可能会忽略社会事实本来的面貌,也可能人为将那些不可操作化的问题删掉。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就会使得传播学中实证研究的问题与社会事实脱节,实证研究的研究领域变小。这也暴露了实证研究正在面临的学术困境:“对于实证研究中可操作化的研究问题,往往是一些无需进行理论论证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做到理论创新;而对于需要实证研究去探索的问题,由于无法成功地将理论概念转换为外在事实,实证研究或无能为力,或者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24]

其二,实证研究难以对时间变量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只能解决在同一个时间横截面上的空间问题,因此在实证研究中,研究者很难做到对时间变量进行研究,很难展现社会变迁、规律变化。如果对传播学领域的某项实证研究做时间对比,那将需要巨大的工作量。以拉扎斯菲尔德在伊里县所做的调查为例,拉扎斯菲尔德对伊里县进行了时长半年的反复回访,就已经难以继续。当把时间因素考虑进研究问题中,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就会因巨大的工作量使得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即使采用回访的方法也面临着很多问题:一是不

能保证反复回访的对象一致性,这使得研究变得毫无意义;二是反复回访会使研究的信度下降,使得数据可信度得不到保障。21世纪以来,历史阶段数据比较法开始流行,仿佛能够进行历史性的比较,但实质上它所解决的只能是不同时间横截面上前后变化的问题,而且研究数据是来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此信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更不用说研究所涉历史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实证研究时,会把传播现象从历史背景中抽离。

其三,实证研究过分强调探究直接因果关系,难以解释不断变化的传播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研究者在对传播现象进行研究时通常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对象的各个要素之间是互动关系,在互动过程中,文化、心理等各种复杂因素会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建构与再建构研究的情境与现象。另外,由于实证研究过分强调探究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在进行研究时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因果关系,但多重相关的因果关系很难再统一成为一个整体,高度碎片化且难以构成理论。因此,如若实证研究的方法不能使用得当,其研究结论就会成为现象的简单描述。因而实证研究虽然在探索性研究以及发现新问题方面有优势,但是在理论创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

四、回归价值理性:技术时代的新实证主义取向

回溯7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科对实证主义的接纳、质疑、挑战、融汇的过程,与新中国技术发展历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整体变迁紧密勾连。从唯技术论、唯数据论、唯量化的绝对科学主义,迈向了更加包容、开放、交融的多元研究范式。这不仅是单一学科研究范式的变迁轨迹,也是整体社会科学进展的基本脉络。

(一)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重振工具理性

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研究存在以下弊病:一是思辨研究依然占据主流,且这些研究很多都缺乏逻辑性,有些甚至是反科学的。廖圣清等^[25]考察了1998—2017年间发表在9本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现,仅21.5%的论文采用实证研究取向,90.9%的论文没有研究方法,思辨研究依然占据主流,但90%以上的论文不包含理论,大部分研究没有理论框架,甚至在研究中提及任何理论,这显然与学界以思辨研究为主流的现实是相悖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思

辨研究缺乏理论与逻辑。二是实证研究规范性不够,尤其是定性研究的规范性尤为欠缺。很多研究者将定性研究与思辨研究混淆,认为只要不使用数字或者数学分析就属于定性研究。另外,很多研究在研究之前没有进行研究设计,存在经验主义、跟着感觉走等问题,这显然不符合定性研究的规范性,也与实证研究“可复制”的要求不符。三是新闻传播学界有一股反实证的风气,认为实证研究无深度,使用复杂方法验证常识,并认为量化研究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简化等。对于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工具主义问题,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仍然比较薄弱,作为社会科学中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科,在快速发展的体制化过程中,应该保持对工具主义的清醒认知,“警惕工具主义”“反对唯方法论”和“方法祛魅”,对工具主义的研究过分强调,对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没有帮助^[24]。

这些批判都具备其合理性,但实证研究在检验发展理论方面确实起到重要作用,而如何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量的变量和指标,也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事实上,上述问题都源于实证研究发展还不够规范与成熟,应以包容和促进成长的心态看待。研究方法的规范与科学是一门学科走向独立与成熟的标志,这也得到了新闻传播学者的普遍认同。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研究者跳过了对于方法重要性的回答,将研究重点聚焦于研究方法具体操作技术层面。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是工具,工具使用规范的目的是使研究过程更加科学^[26]。

(二)重视实证研究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性意义

新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对我国传统的人文—历史—哲学思维产生了冲击与挑战。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较晚,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化思维浸润后,传播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引入受到学界的欢迎。21世纪以来,以智能化为核心,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技术变革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上,而且直接表现为对学科关系和知识体系的重构。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一些先进的科学仪器与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开拓更多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客观与精确,如喻国明等^[27]使用脑电技术研究情绪化文本内容的传播效果等。还有许多代表新范式、新取向的方法也正在逐步应用,比如代理人基模型(ABM)、社会网络分析(SNA)、地理信息系统

(GIS)、解释结构模型(ISM)、博弈论等新方法和新技术都已经应用到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中来。

必须承认的是,实证主义范式与方法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它使得研究范围不断拓展,学术研究渐趋规范,补充了传统人文—历史—哲学方法的情感逻辑,检验和发展了新闻传播学科理论且具有很强的现实应用性。我们当下身处大数据时代,对数据进行合理利用能够有效促进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如今,智能传播又成为新的热点话题,智能传播是将具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信息生产与流通中的一种新型传播方式,许多人工智能技术如社交机器人、算法推荐等技术已经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深刻变革,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智能传播时代,现有新闻传播学范式下的理论和方法更加需要拓展,如此才能对新的智能传播现象更有解释力。

参 考 文 献

- [1] 卜卫. 传播学方法论引言 [J]. 国际新闻界, 1996(4): 32—38.
- [2] 喻国明, 吴文汐, 许子豪. 在多维空间的解析中把握媒介接触时间: 关于媒介注意力测量新范式的探讨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10): 12—16.
- [3] 薛可, 陈晔. BBS 中的“舆论领袖”影响力传播模型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饮水思源”BBS 为例 [J]. 新闻大学, 2010(4): 87—93.
- [4] 郑丽勇. 媒介影响力乘法指数及其效度分析 [J]. 当代传播, 2010(6): 20—23.
- [5] 周葆华. 算法推荐类 APP 的使用及其影响: 基于全国受众调查的实证分析 [J]. 新闻记者, 2019(12): 27—37.
- [6] 师文, 陈昌凤. 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 基于《纽约时报》“惨例”风波报道在 Twitter 上扩散的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0(5): 5—20.
- [7] 夏倩芳, 张明新. 新闻框架与固定成见: 1979—2005 年中国大陆主流报纸新闻中的党员形象与精英形象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02): 29—41.
- [8] 喻国明, 李彪, 丁汉青, 等. 媒介即信息: 一项基于 MMN 的实证研究: 关于纸质报纸和电子书报纸的脑认知机制比较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10(11): 33—38.
- [9] 孙旭培. 学术规范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 兼与喻域先生商榷 [J]. 新闻大学, 1999(1): 13—20.
- [10] 张振亭. 试论我国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演变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11): 241—245.
- [11] 汤志伟, 彭志华, 张会平. 公共危机中网络新闻可信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J]. 情报杂志, 2010(4): 36—40.
- [12] 刘建明. 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式 [J]. 现代传播, 2002(2): 39—41.
- [13] 陈强, 曾润喜, 徐晓林. 网络舆情反沉默螺旋研究: 以“中华女事件”为例 [J]. 情报杂志, 2010(8): 5—8.
- [14] 周裕琼, 林枫. 数字代沟的概念化与操作化: 基于全国家庭祖孙三代问卷调查的初次尝试 [J]. 国际新闻界, 2018(9): 6—28.
- [15] 于文轩, 樊博. 公共管理学科的定量研究被滥用了吗: 与刘润泽、巩宜萱一文商榷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0(1): 159—166.
- [16] 陈阳. 议程设置理论在北京的一次检验: 基于 CGSS (2013) 数据的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17(10): 77—90.
- [17] 吴锋. 政府首脑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选择机制: 理论阐释、影响因素与改革策略 [J]. 国际新闻界, 2017(2): 31—51.
- [18] 秦雪冰. 消费者洞察的 NKP 模型: 社会网络分析在智能广告中的应用 [J]. 当代传播, 2020(3): 77—80.
- [19] 卜卫. 方法论的选择: 定性还是定量 [J]. 国际新闻界, 1997(5): 49—54.
- [20] 李彪.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构造: 对 1995—2007 年我国四种主要学术期刊的考察 [J]. 国际新闻界, 2008(1): 26—29.
- [21] 卜卫. 论传播学定性研究方法 [J]. 国际新闻界, 1996(6): 46—51.
- [22] 张敏, 任中峰. 传播学沿着哪条道路奔跑: 量化和质化之争的历史回顾与理论启示 [J]. 当代传播, 2011(5): 4—7.
- [23] 朱鸿军, 苗伟山, 孙萍. 学科建制下的规范化: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 70 年(1949—2019)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10): 21—35.
- [24] 胡翼青. 传播实证研究: 从中层理论到货币哲学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3): 9—16.
- [25] 廖圣清, 朱天泽, 易红发, 等.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谱系: 议题、方法与理论(1998—2017) [J]. 新闻大学, 2019(11): 73—95.
- [26] 卜卫. 论社会调查方法的逻辑及价值 [J]. 国际新闻界, 1997(1): 58—63.
- [27] 喻国明, 钱绯璠, 陈瑶, 等. “后真相”的发生机制: 情绪化文本的传播效果: 基于脑电技术范式的研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4): 73—78.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 [1] 杨保军, 王阳. 论新闻学术话语的形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19—125.
- [2] 张昆. 新闻传播教育史体系刍议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2): 116—122.
- [3] 李明德, 王含阳, 张敏, 等.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能力培养的目标、困境与出路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 123—130.
- [4] 杨保军. 论新闻规律的形成机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96—103.
- [5] 傅居正, 喻国明. 中外数据新闻研究的滥觞与发展: 学科谱系的比较: 基于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 111—120.
- [5] 张立, 杨文涛, 尤瑜, 等.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图谱与热点分析: 基于 2000—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实证分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37—144.
- [6] 贾文山, 刘杨. 跨文化传播的诠释学视角: 以中国语境为例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123—129.
- [7] 李明德, 张园. 传媒社会责任意识的深层建构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101—106.
- [8] 李明德, 刘婵君, 张立. 构建富有特色的新闻传播教学科研体系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116—121.
- (责任编辑: 张园)

Convergence and Controversy:

The Evolution and Practice of Positivism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Li, TENG Xiaoy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Journalism research in China started late and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humanistic-historical-philosophical thinking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journalism research has been enriched and challeng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 thinking,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scientific methodology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 academic circles. Positivism paradigm makes the research scop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xpand, the research topics are diversified and deepen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tandardized, it complement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traditional humanistic historical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ests and develops the the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to hav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positivism also faces disputes on methodology, knowledge contribution and methodological defects.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the orientation of new positivism should return to value rationality, while the exist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under the paradigm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eed to be expanded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new phenomenon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positivism; research paradigm; research methodolog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value rationality;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